



绽放的女性生命之花

——读黄玲小说集《玫瑰芬芳》

● 杜福全



作为大学教授的黄玲,其小说创作一直浸润着知识分子的印记。这种印记,是一个作家将自己对人性、对社会、对生命、对生活深层的认知和思考,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呈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和精神面貌。

抛开大学教授这一身份不说,黄玲在文学领域兼具研究者和创作者的双重角色。在文学研究方面,她出版过《李乔评传》《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妖娆异类——海男评传》等专著和大量评论文章。纵观其文学活动,不管是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带有浓郁的女性色彩:她研究和评论的作家中,女性作家居多;她研究的作品中,以写女性为主的作品居多;她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女性。

关于女性作家和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这个话题,在伍尔夫、波伏娃、杜拉斯等一些女性作家和女性学者的著作或文章中均有讨论。她们认为,女性作家的写作,尤其是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相较于男性作家来说,确实存在视角上和表现上的明显差异,对于女性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生存处境、人生命运的体悟和描绘,也与男性作家有着明显的

区别。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一文中以大量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描绘为参照,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甚至以幽默讽刺的笔墨抨击了当时男性作家对女性作家和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偏见。

黄玲曾在《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一书中写道:“女作家观照、表现世界的方法、视角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由此而形成的温婉细腻、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也是有目共睹,和男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互补状态。这对文坛而言,也是一个丰富、多元的现实存在。”在她看来,女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只是方法论的问题。秉持着这样的立场和态度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可以从主观上避免某些偏见和歧视的产生。

萨义德曾提出过一个观点:“知识分子总要有选择:不是站在较弱者、代表不足、被遗忘或被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黄玲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关注女性的生存处境和人生命运,关注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关注女性的精神状况。这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一个作家的选择。这种选择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作家潜意识里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它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左右,依赖于良知作出独立的判断和取舍。

黄玲的小说集《玫瑰芬芳》里收录了6篇小说,主人公全都是女性。从书名即可看出,这是一本女性之书。《香樟树女儿》虽然是一篇童话,但也可以看作是女性童年时代的缩影,它关注的是童年女性的天然秉性,书写女性孩童的纯真心灵和天然情感;《妖精女生》关注青春期的女孩,窥探少女青春萌动、情窦初开的隐秘心事;《玫瑰芬芳》关注贫困山区贫困女孩的人生命运,书写青年女性自立自强的成长故事;《香水百合的梦》这组幻想小说,虽然主人公是一些动物或古怪精灵,但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作青年女性的爱情故事来看,它探寻的是女性内心深处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浪漫情怀;《芙蓉花开》讲述了一个城市女性的婚变历程,关注的是

城市女性的婚姻家庭和人生命运;《牛翠花进城》讲述了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妇女的“成名史”和“历险记”,关注的是农村妇女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综合考察这些小说,虽然每篇小说都单独成篇,人物、故事、情节和场景相对独立,但这些故事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气韵又是相互贯通的。《玫瑰芬芳》里的人物,涉及农村女性和城市女性,从童年女孩到中老年妇女,讲述了女性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集就是一部女性成长史,具有女性人类学的参考价值。作家以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从生活的现场全方位、多角度地体察和探测女性微妙的生命情感,考察和探寻她们隐秘柔软的情感世界和复杂微暗的精神世界,用极具生活气息的生动笔法,描绘出一幅具有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的女性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

小说借鉴了“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戏剧艺术创作原理,在矛盾和冲突中层层推进故事结构,让人物在应对矛盾和冲突的行为中凸显出鲜明的性格特征。比如《玫瑰芬芳》中的女大学生普玫瑰,她的人生就是在留守与逃离、贫穷与欲望、爱情与金钱、亲情与尊严等一系列矛盾中,不断做出取舍和选择的过程,从而凸显出个性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精神。《芙蓉花开》中的城市妇女白芙蓉,《牛翠花进城》中的农村妇女牛翠花……当她们从故事中走来时,作家已为她们营造出了鲜活而生动的生活场景,为她们的人生境遇铺设了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让她们在矛盾和冲突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在行动中彰显出她们丰富的情感世界、鲜明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况味和隐秘的精神世界。

文学批评家布鲁克斯曾说:“小说从来不是孤立地处理人物性格的,因为怎样的人决定他有怎样的行为。作为观察者,我们也是首先根据人的行为来判断人的。”也就是说,人物的性格与行为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在现

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人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因此,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必然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就需要在冲突中做出回应和选择,在取舍和选择的系列行为中,人的价值观念、情感世界和精神面相就会生动形象地凸显出来。

黄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人生经历坎坷崎岖,生活跌宕起伏,命运多舛,但最后几乎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值得信赖的归宿。这并不是说,作者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或者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世界,而是因为,作为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黄玲深知,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路径去架构故事,矛盾和冲突终究会走向妥协、消解或者和解——与人和解、与物和解、与自我和解。这是人在哲学意义上的出路。实际上,为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纾困,为小说中的人物探索和寻找可能性的出路,也属于一个作家的职责范畴。

福斯特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各号人物,或许是作家在狂热的兴奋中创造出来的,但这些人物的本性仍旧是小说家通过推己及人构想出来的,融入了作家本人的体验。约翰·加德纳也说:“任何文学作品的价值或者‘永恒魅力’最终都与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性格和品性有关——他的本能、他对艺术和世界的认知、他的驾驭能力。”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事物、做出判断的可信度,并不属于技术层面的范畴,而是属于作家的认知和道德范畴,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精神品性。

黄玲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和女性作家,对女性生理、心灵、情感、精神等方面的认知和探寻,既有感同身受的切身体悟,又有推己及人的客观体察,还有深层的理性思考,其作品对女性生命的探究和抵达,在角度、视域、深度和广度以及呈现方式等方面都有别开生面之处,为读者洞察女性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窗口,呈现出斑驳瑰丽的别样风景。

我家的老屋在一个大大的四合院里,邻居们总喜欢把自己居住的四合院叫作“院子头”。大家常说:“这么多年来,我家院子头从来没有遭过贼。”“我家院子头这些年来在外面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有时候回家,和邻居们摆龙门阵时,我讲起自己在外面干治安工作的事,他们会笑着说:“我家院子头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有麻烦过警察!”

我家院子头修建于一百多年以前,虽然是土木瓦结构,但整个建筑整齐有序,颇有气派。院子头的住户们长年累月地待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大家既是邻居,又像一家人,无论谁家遇到大事小情,都会相互帮衬。

院子中间有一块地坝,那是孩子们的乐园。夏秋之际,院子里到处都有蜻蜓的身影。在我的老家,人们习惯把蜻蜓叫作“蚂螂”。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生灵,轻盈、美丽、安静,最关键的是,蚂螂从不糟蹋粮食,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它们。我们从小就受到老人们的告诫:不允许伤害蚂螂,因为它们是雷神公公的坐骑,如果伤害了蚂螂,就得罪了雷神公公,后果不堪设想。

晚饭过后,各家将晾晒在地坝里的粮食收回,鸟儿们也开始归巢,小孩子们则在坝子里玩游戏。这些游戏虽然简单,但种类却很多,比如用铜币丢钱窝儿、老鹰抓小鸡、打地格螺(玩陀螺)……

夜幕降临,周围黑黢黢的山峰上皓月初升,天地间突然变得流光溢彩,辛苦了一天的大人们纷纷被这人间美景所吸引,各自坐到家门口摆龙门阵。院子里开始热闹起来,孩子们从东家串到西家,无忧无虑地嬉戏打闹。跑累了就坐在一起唱童谣:“星宿呀,排对排,过路大姐好人才,拴匹围腰带,灯笼裤,红布鞋,勾腰儿勾腰儿捡干柴,捡到郭家观音崖。八头猪,八只羊……”儿时耳熟能详的童谣,已多年没有听人唱起,我自己也记不太清了。偶尔在睡梦里听到,恍惚中醒来,已是热泪盈眶。

夜逐渐深了,有的小孩子已经趴在家长的怀里入睡,大人们天南海北的龙门阵结束了,孩子们的嬉戏也被迫叫停。而这时候,水田里的青蛙叫得正欢。此起彼伏的蛙声,有时是合奏,有时是个别的轻吟浅唱。我一直都喜欢听蛙鸣,孩提时,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都是在悦耳的蛙声中进入梦乡的。

如今,那座四合院已经不在,乡邻们搬进了宽敞舒适的住房。可我们仍习惯说“我家院子头”,大家见面时仍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曾经庇护过我们的那座院子,已完成它的使命,被拆除了。每到月夜,我常常会仰望星空,寻找月亮里的桂花树,寻找天河的方向,回味我家院子头的那些美好时光。

我家院子头

● 颜光华

心之所系的三合

● 余 历

据说叫“三合”的地方有很多,但让我刻骨铭心的,唯有位于永善县黄华镇的三合村。这里三面环山,中间的山巍峨耸立,两边的山较为矮小,犹如一位母亲张开双臂抱着她的孩子。村街子地处最高这座山的腹部,好友的家就在街下面不远处。

初次听说三合,是好友张勇告诉我的,他说:“我家住在三合村街子的下面。”张勇是我上初中时最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那时,我们个子都很矮小,却酷爱篮球,因为篮球对我们而言,是唯一可以花最少的钱,却能够带来最多快乐的运动。一个60元的篮球可以用一年,打完球后能喝上一瓶可乐就很满足。

张勇家共4口人,妹妹在老家上小学,他在县城读初中,父母在外务工。我们就读的县二中当时没有住宿条件,所有学生都是走读,县城的孩子住在自己家里,乡下的孩子则需要在学校附近租房子。张勇比我大两岁,性格也更为成熟稳重,他为人踏实、乐观、正直、幽

默,总是会考虑别人的感受。记得有一次,他知道我被班上的同学欺负了,就像大哥哥一样宽慰我,形影不离地照顾我,陪伴我。

父亲当时在乡下教书,继母带着我、姐姐和妹妹在县城读书。继母对我们不好,所以我经常不想回那个没有温暖和关爱的家,甚至索性不回去睡觉。有时我没钱了,就在张勇那里蹭饭;晚上不想回家了,就跟他一起住,我们虽不是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县一中,张勇则选择了市里的一所建筑类职业技术学院。因高中学业压力太大,我们便极少联系。在短暂拥有手机的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和他联系,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后来,家人以话费贵和影响学习为由,没收了我的手机,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但初中那份真挚深厚的情谊,始终深深镌刻在彼此心间。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昆明工作,无数次幻想有朝一日我们能再度重逢,但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偶然从初中同

学口中得知张勇已经去世。我起初拒绝相信,但后来从张勇的亲妹妹口中得到了证实,说张勇早已不在人世……远在他乡的我泪如雨下,难以接受那位曾与我约定他日一定把酒言欢、畅谈未来的挚友,那位二十出头、活力满满、优秀善良的青年,竟然已经辞世。

自此,三合成了我心之所向、梦之所系,一直想要去看看张勇和他从小生活的家,还有他和我谈起的那些童年趣事的发生地。终于,在2015年春节假期,我骑着父亲的摩托车,踏上了前往三合的行程。因为不熟悉道路,我边走边打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几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张勇的故乡——三合。对于我来说,这里既亲切又格外陌生:亲切的是,我终于来到了张勇口中的那个生他养他的“三合”;陌生的是,我再也见不到张勇了,唯一能见到的是他的坟墓。张勇的父母恰巧在家,他们热情地招待了我,还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张勇生前的点点滴滴。张勇自幼跟随伯母一起生活,听话、懂事、正直、善良,是一个很优秀的

孩子。我感慨世事无常、痛恨病魔无情。斯人已逝,空留坟冢一座,如今的我只有无尽的感慨和悔恨,如果我早点联系他,或许还能见他最后一面,哪怕像当初我被欺负时他宽慰我一样鼓励他,也不会留下太多遗憾。

饭后,张勇的父亲拿出了张勇生前的遗物,我找到了我们的合照,许多往事顿时涌上心头,心中酸楚无以言表。第二天清晨,张勇的父亲带我来到张勇的墓前,我不禁伤感,当初那个少年如今竟成了我眼前矮矮的土堆。我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更不知向谁诉说。烧完香、放完鞭炮,与张勇的父亲辞行后,我踏上了归途,心中满是伤心难过,既遗憾不已,又莫名伤感。

如今的三合,早已不见当年低矮的土坯房,随处可见的是镶嵌在这片土地上的小洋楼,房前屋后瓜果飘香。每次回家路过这里,我都会想起张勇,或默默地和他说说心里话,或在心里怀念他,或停车望向他长眠的地方。我的好友啊,若你仍在人世,该有多好。

